

李世英 著

清初诗学思想研究

敦煌文艺出版社

晚香好者衆矣。
子園
丁
爲
畫
梅。
清
初
詩
學
思
想
研
究
李
世
英
著
唐
肅
編
東
蘇
校
貴
宇
存
不
惜
以
自
娛
且
以
公
世。

227.49

1

清初诗学思想研究

• 李世英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书 名 清初诗学思想研究

作 者 李世英

责任编辑 富康年

封面设计 贾 雯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 357 号)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80587-528-6/1·472

定 价 11.6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绪 论

清初顺康时期约八十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剧烈动荡走向稳定统一的时期，也是学术文化转型和繁盛的时期。作为反映社会时代风云和记录士人群体心路历程的诗歌创作非常繁盛，诗家林立，流派众多，各种诗学主张和审美趣尚争奇斗异，相互影响，诗学思想表现出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

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使学术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天崩地裂”的社会现实给予人们以极大的震动和刺激。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对明亡的教训以及整个封建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他们痛感明末士大夫的空谈心性，不求实学，面对内忧外患，束手无策，导致国破家亡，因而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顾元曰：“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范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

久之。”（《存学编》卷二《性理评》）“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在《崇祯儒将》中写道：“朽木本樗材，而为大厦栋。栋摧厦亦倾，徒使贾生恟。”“说起前朝事，至今恨不平。大将称走狗，膝行见书生。”（《榭叶集》卷五）刻画亡国士大夫的嘴脸，尤其形象。顾炎武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卷七），反映了关注现实、变革现实的积极精神，也反映了许多有识见的遗民志士的共同要求。他们继承了晚明东林党人以来即逐渐发展的经世精神，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经世致用的思潮空前高涨。遗民与统治者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对满清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痛感于学术人心的败坏，力倡通经学古，崇实黜浮，寻求富国强民之路。而他们的这种探求与取得政权的新统治者寻找维系人心的精神力量、巩固政权的努力实际上形成一种合力，促成了清初心学衰落、经学盛行的局面。

经世致用的思潮使人们的目光投向了救时济世的实学，同时也培养了学者重实证实悟、归纳考据的求实学风。清初学者治学范围极广，举凡天文、地理、经济、政治、儒学、佛学、礼法、军事、农业，无不穷究深研，博涉旁通，而尤重经史之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博学举世闻名。钱谦益于经史子集外，旁涉佛典杂乘。傅山于书无所不读，号称“学海”，并冲破道统说，首开诸子研究的风气。王士禛除诗歌外，著述尤富，其《池北偶谈》、《香树笔记》、《古夫于亭杂记》等，都可见出诗人学问的渊博。

博学风气推动了诗学的繁荣。王夫之说：“不博极古今四部书，则虽有思致，为俗软活套所淹杀，止可求售于俗吏，而牵带泥水，不堪挹取。”（《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王士禛肯定“学力深始能见性情”的观点，认为“非才无以广学，非学无以运才，两者均不可废”（《师友诗传录》）。清初诗人无论是尊唐还是崇宋，也无论是崇尚陶谢还是追踪李杜，都把渊博的学问当做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博学并不等于文学，学问家并不一定是出色的

诗人，但杰出的诗人却一定是以博学作为基础的。这种恢弘广博的气度，使得清初诗人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明清易代之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使得士人群体迅速分化。按其对新朝的态度和关系，汉族士人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坚持民族气节，不肯与新政权合作的遗民；直接进入满汉联合政权的前明官吏；应清朝科举而入仕新朝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遇和人格理想，反映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思想上，显示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色。遗民是封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与“逸民”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归庄认为：“凡怀抱道德而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归庄集》卷三《历代遗民录序》）遗民坚守志节，不肯出仕新朝，政治上失去了进身之阶，而又生活在新朝的统治之下，他们的行为处事和思想往往与当时的统治思想存在尖锐的冲突。他们怀抱着极高的政治理想：“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顾炎武《病起与蓟门当事书》）而在现实社会政治中却无立身之地，“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屈大均《壬戌清明作》），无法实现其抱负，理想和现实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造成激烈复杂的心境。这种心境是作家创作的内驱力之一。屈大均说：“今天下善为诗者多隐居之士，盖隐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为人所有。”（《翁山文外》卷二《见堂诗草序》）遗民诗人既脱去科场功名的束缚，又远离政治宦海的羁绊，专力于诗的创作，心无旁骛，创作上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心境之中。他们情感郁积既厚，艺术功力复深，登山临水，长啸短吟，缘情叙事，语切景真，成为清初诗歌创作群体的主流。由明臣入仕清朝者，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之、曹溶、周亮工等，他们在文坛上地位既高，影响亦大。清初的满汉之争，南北

党争，民族歧视，使他们在政治上饱受挫折和打击，变节仕清的愧悔也使他们的灵魂备受煎熬。龚鼎之因试图稍稍改变满汉之间的不平等，以缓和满汉矛盾，被连降八级使用。钱谦益降清不足半年即告病归乡，晚年所作《投笔集》，抒写亡国哀痛，表现反清思想，激愤深挚。吴伟业被迫仕清，愧悔万端，临死墓碑上只愿以“诗人”留名。他们的创作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复杂心态。应清朝科举而入仕的“国朝”诗人，他们早年大都经历丧乱，其早期的诗歌也都多故国之思和抑郁不平之气。顺治十四年，王士禛作《秋柳》诗寄寓亡国隐痛，一时引起包括顾炎武、申涵光在内的大江南北数百人的酬唱应和。面对清初社会复杂的矛盾和民族歧视政策，他们在官场上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王士禛虽以诗文受宠于康熙皇帝，晚年却因与理密亲王即戾太子唱和而以细故被黜（昭桂《啸亭杂录》卷九）。他以提倡“神韵”说而名显一时，可他同时也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香祖笔记》卷一）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政治情势的变动对士大夫处世态度的影响和与其诗歌思想变化之间的联系。

二

每个时代的文学思想都是从前代的文学思想中蜕化衍变出来的。其间或缓慢演化，或激进转变，情况各不相同，而与前代文学思想的联系却是无法割断的。清初诗学家对明代诗学的偏失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批判和抨击，清初的诗学思想与明代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正是明代诗歌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为清人提供了鉴戒和前进的动力。清初诗学家对明代诗歌的批判与发展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着眼于其“失”的一面，探讨明诗衰敝的原因，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诗学思想体系，这以钱

谦益为代表。他对明中叶以来的“俗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反时论，收到了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效果。虽然难免矫枉过正，但他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却提供了认识明代诗学的新视角，使得人们对明代诗歌重新进行审视，从而寻求发展的道路。王夫之、冯班、吴乔等，都对明代前后七子、钟谭作了深刻的批判。明人诗歌创作方面探索的失误和偏弊，给清初诗人增加了超越的信心和勇气。清初诗学家对明诗继承发展的另一方面是着眼于其“得”的方面。这种继承又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批判以七子、钟谭为主线的明诗传统，而重新树立起明诗的另一统系，以说明明诗之成就别有所在。钱谦益勾勒出由高启到李东阳、程嘉燧的明诗“正宗”，以与七子、钟谭相抗。王夫之也指出：“然三百年间，六子之外自有作者，不必向卖花担上选花也。”（《明诗评选》卷五）他们都以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标准来重新勾勒明诗发展的线索和正统。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七子、钟谭的正面肯定，总结他们成功的艺术经验。尊七子的风气在清初仍是很盛的。申涵光主张“就彼音节，舒我性情”（《聪山集》卷一《蕉林诗集序》）。顾炎武、吴伟业、屈大均、李因笃、施闰章等，都汲取了七子成功的艺术经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吴伟业称赞友人“上溯汉魏，下探三唐，含咀菁华，讨求声律，不数年而学大就”（《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毛卓人诗序》），在《致孚社诸子书》中说：“弇州先生（王世贞）专主盛唐，力还大雅，其诗歌之雄乎？……风雅一道，舍开元、大历，其将谁归？”（《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很鲜明地表现了他对明七子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

清初诗学家无论批判七子，还是肯定七子，所共同具有的，却是力图超越前人的追求和气概。清人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明诗、宋元诗，而是整个中国古典诗歌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的成就。尤其是代表中国古典诗歌全盛时期的唐诗，如同壁立千仞的高峰横亘在前，几乎成为难以逾越的理想规范。面对着瑰丽丰富的诗

歌遗产，不少人处于一种复杂的心态之中：“今论诗者曰：夫士以风骚自命，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亦不幸而生于古人之后也。”（孙枝蔚《诗志序》，《溉堂文集》卷一）幸者谓有前人可以取法，不幸者“极盛者难为继，博取者虑不专”，超越古人确乎其难。明七子正是面对盛唐诗歌的辉煌成就叹为观止，遂将重现盛唐风貌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以如此心态去对待传统，自然难以超越前人而创新前进。清人从七子复古而趋于雷同肤廓的弊端中汲取了教训，看清了诗歌衰落的原因：“诗何以不古若哉？盖其患不在于真衰而在假盛。真衰可起而假盛不可为也。”（杜浚《喻先生诗序》，《变雅堂集》卷二）看不到自身的缺失，自然无法纠正其弊端。透过现象认识到“假盛”的实质，才有可能走向“真盛”。清人发现了明人的弊端，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来对待古代的遗产：“诗无古今，惟其真尔。有真性情，然后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后有真风调。勿问其似何代之诗也，自成其本朝之诗而已。勿问其似何人之诗也，自成其本人之诗而已。”（尤侗《吴虞升诗序》，《西堂杂俎二集》卷三）正是这种“自成其本朝之诗”、“自成其本人之诗”的自信、豪迈的气度和精神，激励诗人去从事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建设，把抒写真情、表达个性放在首位，追求富有自己时代和个人风格的真诗，使中国古典诗歌又一次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三

清初诗人身历国破家亡之痛，面对严峻复杂的社会生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转向关注现实，反映现实。顾炎武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卷十九），王夫之主张以诗教“救人道于乱世”（《俟解》），都非常注重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文学关注现实。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在诗人们对“诗史”说的阐发

中，表现得十分强烈。“诗史”之说，起于唐末孟棻《本事诗》中对杜甫诗的评价，宋人多用之，意谓杜甫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现实生活。清初诗人身历鼎革，对杜甫的“诗史”精神感受尤其深切。黄宗羲认为诗歌不仅可以证史，而且可以“补史之阙”（《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万履安先生诗序》），杜浚指出诗可以“正史之讹”（《变雅堂集》卷二《程子穆倩放歌序》），施闰章认为诗兼比兴，其风婉以长，“其用有大于史者”（《学馀堂文集》卷四《江雁草序》）。清初诗人，以遗民为主体，他们提倡“诗史”精神，尤其注重以诗歌来表现民族精神和气节，“君子处乱世，所患无心耳，心存则天下存”（屈大均《翁山文钞》卷二《二史草堂记》）。遗民诗人创作中反映现实的精神是十分突出的。明清之际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圈地、剃发、流人、税敛、科派……都在诗人笔下有真实的表现。尽管由于清代严酷的文字狱，“贾祸诗文尽数删”（阎尔梅语，见《阎古古全集》卷一《年谱》“康熙十四年”下引）流传后世的作品远非原貌，但就现存作品来看，其中所贯穿的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仍然是十分强烈的。这从乐府歌辞创作的繁盛尤可以见出。吴伟业、申涵光、钱澄之、吴嘉纪、杜濬、施闰章等，都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和黑暗现实的乐府歌辞。许多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作品都被冠以“诗史”的称号。如人称吴伟业“所作《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雁门尚书行》、《思陵公主挽诗》诸什，铺张排比，如李龟年说开元、天宝遗事，皆可备一代诗史”（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钱谦益明亡后所作《投笔集》，步杜甫《秋兴》韵至十三叠，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被称为“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钱澄之则径以“诗史”称自己的诗歌：“其间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

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生还集自序》）他们是自觉以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保存信史为己任的。只要把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和创作态度与晚明钟惺谭元春所提倡的表现“幽情单绪”、“孤怀孤诣”的主张相比较，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到诗歌思想所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巨大。

高倡“诗以道性情”，以“性情”说救正“格调”说的弊端，是清初诗学思想的一大变化。首先起来激烈抨击明七子形式主义诗风的，是钱谦益。他强调“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有学集》卷四十七《题燕市酒人篇》），提倡“真诗”，批评摹拟复古之病为“僞、剽、奴”（《有学集》卷三十二《郑孔肩文集序》），“排击俗学，海内惊瀑，以为希有”（《有学集》卷三十九《答山阴徐伯调书》），造成很大影响。顾炎武、王夫之等，对摹拟剽窃的风气，都作了深刻的批判。许多诗人都对“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决定作用加以阐发。周亮工曰：“古人之为诗，未有舍性情而专言格调者。今人好称格调而反略于性情，此诗之所以不古也。”（《赖古堂集》卷十三《西江游草序》）尤侗曰：“诗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风格立焉，华采见焉，声调出焉。无性情而矜风格，是鸢集翰苑也；无性情而炫华采，是雉窜文囿也；无性情而夸声调，亦鸦噪词坛而已。”（《西堂杂俎三集》卷三《曹德培诗序》）批评一味追求风格华采声调的形式主义诗风，十分尖锐而精辟。从理论上对“性情”说作了全面论述的，当推黄宗羲。他说：“夫诗以道性情。自高廷礼以来，主张声调，而人之性情亡矣。”（《景州诗集序》）黄宗羲从“性情”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性情的内涵、性情的磨砺烹炼等方面对“诗以道性情”的传统命题作了深入的阐释，标志着“性情”说在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

“诗以道性情”是儒家传统诗歌主张的重申，并非清初诗学家的独创。但它在清初受到人们普遍重视，并被强调到至高无上

的地步，却是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的。诗歌的本质是抒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摹仿拟古者，他们所追求的却是摹拟、恢复盛唐的格调气象，甚至连字句、口吻都力求逼肖于古人，而他们所丧失的，恰恰是诗歌最本质的内涵，即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创造。正如顾炎武所说：“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日知录》卷十九）要使诗歌创作摆脱摹拟复古的泥淖而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就必须正本清源，真正恢复诗歌言志抒情的传统，全面清算形式主义诗风的弊端。这正是从理论上对片面追求格调者的根本否定。清初反摹拟复古的诗歌革新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成绩，从而保证了清人免蹈明代追求复古而诗歌不振的覆辙。强调表现“真情”，但并非一切“真”的都值得表现。清初诗学家在强调抒写性情的同时，主张诗人要根本经史以陶冶性情，表现与时代精神和现实内容相关联的崇高之情、正大之情。归庄认为建安七子和杜甫的诗歌之所以“寄托深远、感动人心，使读者流连不已”（《归庄集》卷三《吴余常诗稿序》），就在于他们表现的情感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一身之遭遇，愁愤之小者也，岂知天下之事，愁愤有十此者乎？”（《归庄集》卷三《历代遗民录序》）清初诗学家把抒写个人感情与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从而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了发展的历程。这既纠正了摹拟复古的弊端，也使得诗歌创作不致因强调真情而流于表现琐屑俚俗之情。

四

主张发挥个性、不相依傍，是清初诗学思想的显著特点。明代诗歌的一个突出弊端，就是雷同依傍，淹没个性。前后七子独尊盛唐，追求格调气象，天下翕然响应，海内同风。吴乔曰：

“弘嘉诗派浓红重绿、陈言剿句，千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谓之诗家异物，非过也。”（《围炉诗话》卷一）竟陵以“幽深孤峭”相号召，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门户依傍风气同样十分严重。清初诗人立足于现实生活，力主表现真性情，打破了这种雷同依傍的局面，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趋向多元。从诗歌理论方面来看，清初诗学家注重对传统诗歌理论的整理和总结，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和自己的个性予以新的阐释和发展。如钱谦益对“诗言志”作了大胆的引申和强调，主张“有真好色，有真怨排，天下始有真诗”（《有学集》卷十七《季沧苇诗序》）。黄宗羲论“性情”，顾炎武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王夫之论抒情诗的艺术本质，都各有独到的见解。傅山的诗学思想在当时并无很大影响，但他反奴性、尚率真的理论主张却有着鲜明的异端色彩，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金圣叹以“分解法”说唐诗，颇遭时人非议，然亦显示了试图建立批评的形式规范的努力。王士禛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艺术理论，特别是司空图、严羽的诗说，主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使“神韵”成为对中国古代抒情诗含蓄淡远的审美境界的高度概括，影响广泛而深远。叶燮以文学史家和理论家的恢宏气度和眼光，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和创作规律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和总结，其诗学思想体系以最富理论色彩而著称于清初诗坛。在其他数量众多的诗话著作和诗文序跋中，有价值有创见的观点时时可见，显示了清初诗歌理论的繁盛局面和诗人们各抒己见的精神。

从诗歌流派和审美风尚来看，清初诗人反映个性、不相依傍的精神尤为鲜明。就总体而言，清初诗人大致可分为尊唐和主宋两大阵营，但由于每个人遭际与思想不同，诗歌传承和审美趣味不同，其取法唐宋的着眼点和角度也不同。钱谦益承李贽和公安三袁之余绪，积极提倡宋元诗，兼综香山、眉山、剑南、遗山之

精神，对冲破明人独尊盛唐的局面起了巨大作用。而在他影响下形成的以冯舒冯班为代表的虞山诗派，却不取其尊宋之立场，转而以晚唐、西昆相号召。同样提倡宋诗，黄宗羲推许江西诗派，以曲折峭拔盛称，查慎行则倾心于苏轼，以才气开展、功力纯熟取胜。叶燮以杜甫、韩愈、苏轼三家并举，提倡生、新、深。吴之振、汪懋麟、宋荦都取法宋诗，而各有面目。清初尊唐风气仍占主流，但与明七子的摹仿盛唐格调已颇为不同。吴伟业浸润于唐代大家，“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于乐府歌行独有造诣，创“梅村体”，开娄东派。王士禛不满于尊盛唐者之肤廓空泛，取径王、孟、韦、柳，以风调神韵擅场于北。朱彝尊力主盛唐，而晚年则兼取唐宋诸大家，以才藻魄力独步于南。顾炎武、吴嘉纪、李因笃都深心学杜，沉郁慷慨而自具性情。孙枝蔚、方文则注重学习元白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经验，以上窥杜甫。河朔诗派提倡燕赵悲凉慷慨之风，岭南三家标举粤东雄直清新之气……一时诗坛，群芳竞秀，争奇斗妍，十分繁盛。“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宋滞胸中。”（陈恭尹语）无论尊唐还是主宋，都只是学诗的途径而非目的，诗歌创作最关键的仍在于抒写真情，自成面目。纳兰性德《原诗》中曰：“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嫌，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此虽狂言，然不可谓不知诗之理也。”（《通志堂集》卷十四）钱澄之的这种强调个性、不主故常的创作态度，在清初是很有代表性的。徐世昌评清初诗坛曰：“昔人本学问为文辞，各极其所诣，于同时名宿，不相附丽，不相訾警，盖自信皆足以传，初无取于相竞。”（《晚晴簃诗汇》卷四十一）这种力主个性、不相依傍的精神，是清初诗人能够超越元、明，开创清诗繁盛新局面的重要原因。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诗学思想	1
第一节 顾炎武	1
第二节 黄宗羲	10
第三节 王夫之	24
第二章 江左三大家的诗学思想	36
第一节 钱谦益	36
第二节 吴伟业	49
第三节 龚鼎孳	57
第三章 江浙其他诗人的诗学思想	64
第一节 冯 班 附吴 乔 贺 裳	64
第二节 吴嘉纪 杜 浚 归 庄	73
第三节 金圣叹 徐 增	89
第四章 岭南三大家的诗学思想	100
第一节 屈大均	100
第二节 陈恭尹	112
第三节 梁佩兰	119
第五章 北方诸诗人的诗学思想	124
第一节 申涵光	124
第二节 傅 山	129
第三节 李因笃 孙枝蔚	139

第六章	入清后成长起来的诸大家的诗学思想	151
第一节	宋 琬 施闰章	151
第二节	王士禛	167
第三节	朱彝尊	183
第四节	赵执信 田 雯	192
第五节	查慎行	207
第六节	叶 燮	217
参考书目		230
后记		235

第一章 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诗学思想

明清易代之际的巨大社会动荡，促使无数有志之士直面严酷的社会现实，从天下兴亡的高度去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思考和总结，社会思潮发生了重大转变。其重要标志就是要求关注现实、积极寻求救国治民道路的“经世致用”思潮的空前高涨。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反映在诗歌思想上，就是诗歌的社会作用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诗人们努力摆脱明末摹拟复古和追求“幽情单绪”风气的影响，把视线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国破家亡的惨痛和人民的疾苦，表现诗人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和民族气节，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同时又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因而，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在这一转变时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入。顾炎武的嗣祖顾绍芾留意史事，关心现实，经常告诫他要致力于实学：“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亭林